

后现代主义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 文化权力碎片化

王庆奖 杨 燕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后现代主义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 文化权力碎片化

王庆奖 杨 燕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化权力碎片化 /

王庆奖，杨燕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 - 7 - 5482 - 1955 - 2

I. ①后… II. ①王… ②杨… III. ①文化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9876 号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化权力碎片化

王庆奖 杨 燕 著

策划编辑：叶枫红

责任编辑：叶枫红

封面设计：刘 雨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1.625

字 数：220 千

版 次：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2 - 1955 - 2

定 价：36.00 元

社 址：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发行电话：0871 - 65033244 65031071

网 址：<http://www.ynup.com>

E - mail：market@ynup.com

前　　言

一、写作动机

1964年，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以及随之出现的“伯明翰学派”，标志着文化研究的正式出现。这一过程的倡导者首当提及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aggart）。而此时后现代主义理论开始从法国传播到美国并启动了西方世界新一轮的时代思潮。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联是文化研究从来就带有某种后现代性质，所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说：“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①因此写作本书的最初动机是学术潮流使然。1998年我在南京大学攻读学位，有幸聆听我国著名哲学家张异宾教授的课程“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此便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1999年，我到英国为博士论文寻找选题时，亲身经历了后现代理念的一些文化实践，加深了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理解。此后十余年，我一直都在认识和了解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煎熬，后来才知道是因为这不解之缘中的“不解”原来是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不甚了解。虽是，还是决定把一些认识写下来，英国哲学家培根不是说过“写作使人精确”吗？不写就表明认识还不到位；写了，至少有些认识上的收获。2004年的时候，我受聘到云南大学外语学院去给硕士生讲授“美国大众文化”课程时，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观点来分析美国大众文化的特性，更觉得应该把对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体会、感想和思考付诸文字，于是便在此后的几年里陆续发表了相关的论文。我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是从理论开始，不过正式书写有关后现代主义的文章却是从实践开始的。2006年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并通过对美国麦当劳快餐的考察，写下了题为《文化视觉下的麦当劳的民主性研究》

^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版，第400页。

的学术论文^①。由麦当劳现象的特征中，我论述并试图建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些特征并用于指导研究生的硕士学位论文和本科生的课题研究，增加了他们对后现代主义的了解，我也从中受益匪浅。在我的教学工作中，我也试图以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去分析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英美文学的一些作品、讨论中西跨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辨识后现代时期的一些文化现象，也有不少的收获。

在研究后现代主义的过程中，有两个人是无法回避的。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赵一凡先生。早年一直听说过赵先生的大名，也读过不少赵先生写的和翻译的书。2010 年后在一些场合有幸与赵先生交流，他的见识、学识和辨识事物的才能，尤其是他对后现代主义理论深入浅出的讲解征服了我，也让我对该理论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另外一位是我的同事，即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杨燕老师，她以其对后现代理论的浓厚兴趣及其对后现代理论在语言学、文学和史学方面的深刻认识而加入到了这个研究的行列。她与我一样，也常常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遇到一些需要使用后现代主义理论来进行解读的情况。于是，我们决定写下这样一本小书，一方面可以让自己的思路更加清晰，加深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理解；另一方面提出我们的想法，以便让共同关心这个话题的读者能够为自己提供思考、为本书提出批评、为共同的学术兴趣提高认识。为此她利用业余时间对后现代主义方面的理论进行了研究，对本书的文字组织、文本构建和文章润色，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个动机。不记得是哪位西方学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原话已经记不清，但大意却犹在耳畔，印象深刻：技术理性已经统治这个世界五百年，但是后五百年却是要依靠文化的。这个动机宏观如是，却也不失为促使我们写下本书的理由之一。

二、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文化研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舞台，文化研究的主要特色是伯明翰学派所坚持的平民主义倾向，使研究对象从高雅文化及传统的

^① 此文后被英国剑桥学者出版公司的一本论文集收录并在此基础上改写成本书的一个章节。原文见 Wang Qingjiang & Zhang Yijun, “The McDonald’s Democracy—A Cultural Perspective”, conference paper for American Studies hosted by Hong Kong University in Nov., 2006, and published in Priscilla Roberts ed., *Bridging the Sino-American Divide: American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7.

文学经典中解放出来，注重对通俗文化、大众传媒的研究，大众文化便由此步入学术正轨。从更具体的学术意义上来看，文化研究的主要使命，用霍尔的话说就是“使人们理解正在发生什么，提供思维方法、生存策略与反抗资源”^①。通过文化研究来理解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是其中的学术意义之一，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后现代性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社会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以激烈的形式向“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性所造成的“两种文化”的失衡发起了强有力挑战^②。在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认识的基础上来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具有重要意义。

2. 现实意义。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具有现实意义，这不仅体现在判断目前我国的国内形势方面，也体现在如何理解政治权力（尽管本书并不是针对政治权力的研究）等方面，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的那样，未来中国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的经济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③。而且如今中国正在面临着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型时期，因此“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可以说为观照现代性提供了一面新的镜子，既折射出现代性与传统的矛盾，又折射出现代性自身矛盾的方方面面”^④。

3. 学术意义。文化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正如格罗斯伯格说的那样，文化研究是“极度语境化的”（radically context），它的理论、政治、问题、对象方法以及承诺都是如此。因此，“对于文化研究而言，语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语境（context is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s context）”，他建议最好把文化研究视作“一种语境化的关于语境的理论”（a contextual theory of context）^⑤。因此，在如今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构建中，很难避免与后现代

① 转引自 L. Grossberg, ect., ed., *Cultural Studies*, Routledge, 1992, “Introduction”。

② 崔伟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光明日报》2007年7月10日。

③ 吴敬琏：《中国改革尚在半途：中国的两种前途》，“中国企业家网”2013年9月10日。

④ 崔伟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光明日报》2007年7月10日。

⑤ L. Grossberg, “Cultural Studies, Modern Logic and the Theory of Globalization”, in Angela McRoddie, ed., *Back to Reality? Soc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

主义语境下的文化研究的遭遇，而这种遭遇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分析和阐释文化批评的模式，如文学、语言学、文化交流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乃至哲学等学科的理论把握。

三、论点与方法

1. 现代性所带来的消极现象的不断扩展，使得对“现代性的承诺”的质疑、批判、反思，逐渐构成了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旋律^①，因此本书由此入手，提出了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文化权力及其碎片化的问题，定义并阐述了文化权力碎片化的特点、内在本质、运行模式等。

2. 因为文化被定义为大众的生活方式，即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总和，因此文化权力具有大众性的特点。这个观点属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学派，也被本书所认可。借由这样的观点，本书认为文化权力在人类社会的初期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自然权力，人类历史的进程不过是一个不断争取这种权力回归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要摧毁现代性的过程中种种理性和普遍性力量对人的控制与压抑，寻求思想和生活上的自由的最大化，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出被现代性所压抑的创造性”^②的过程，即文化权力不断碎片化的过程。

3. 本书的碎片与碎片化概念既指日常生活中那些被忽视、受歧视的弱势微小元素，即碎片；也指文化权力不断地下移到这些元素的过程，即碎片化。通过对文化权力向这些微小元素，或者说微小力量下移的论述，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有助于文化权力的自由表达，更加贴近生命的真实，正如左春和说的那样，大众文化的分化使人认为文化与生活、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经济的界限正在消失，任何分化中形成的文化权力壁垒都不利于文化的自由表达，有时则远离了生命的内在真实^③。

尽管本书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剖析，但是对于该理论的一些极端思想并不赞同，正如崔伟奇所说的那样：后现代性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全消融在文化价值之中的另一种极端主义做法，同样不利于文明的健康发展^④。因此就论述的方法而言，本书从多种视角、多个学科汲取养分、借鉴理念，试图以更加全面的方式来论述上述观点，其中最主要的论述方式是比较视

① 崔伟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光明日报》2007年7月10日。

② 同上。

③ 左春和：《文化的权力与同一》，“文化发展论坛”2012年12月18日。

④ 崔伟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光明日报》2007年7月10日。

觉，即：（1）中国与西方的比较，尤其是中美文化权力运行方式的横向比较；（2）历史与现状的比较，尤其是将从中国历史中挖掘出来的文化权力与目前中国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文化权力的运行加以比较；（3）理论与实践的参照，即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理念与美国后现代文化实践和中国宗教、医学的实践进行了参照和比较。本书之所以采用比较的方法来论述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其目的之一就是试图在比较中认识自我，而认识自我的唯一方式只有建立在了解“他者”文化的基础之上，别无他途。

四、本书结构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即“前言”为第一个部分、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为第二个部分，“结语”为最后一个部分（原本打算将第二个部分的篇章分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但是在论述过程中，感觉理论与实践很难加以区分，加之本书采用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论述方式，因此觉得还是把中间的这几个篇章合二为一较好）。

在“前言”中，我们对写作动机、选题意义、论点与方法和篇章结构进行了说明。第一章介绍了后现代文化的一些特点，对文化权力进行了定义，并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对文化权力碎片进行了解释。第二章从文化的定义和对文化的再认识这两个问题入手，主要讨论了文化从形成到定义过程中的人文主义元素，同时借此对文化进行了自己的理解和解读，阐明了文化的大众性与碎片化之间的关系。第三章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文化权力碎片化的经历，其中讨论了四个问题：即世界历史的分期与文化权力之间的联系、神话与信仰时代中中西方文化权力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理性时代中文化权力所受到的压抑与压制、后现代文化时代文化权力的回归问题。第四章阐述了西方人文社会学科中的文化权力碎片化，主要涉及的方面是：文化研究中定义和概念之间存在的张力以及文化研究中的权力转向问题、西方文化研究的三个逻辑以及西方人文社会学科中的文化权力。第五章探讨了语言学转向语境下的语言、文本与史学问题，即在语言话语过程中存在的文化权力以及文化权力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碎片化，文本如何对文化权力进行颠覆，在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下历史学对结构主义权威是如何提出质疑并进行反抗的。第六章试图以中国哲学中人文主义的路径与文化权力的碎片化作为论点来探讨中西方哲学文化中的民本与人本，并认为集体主义的思想是中国文化权力运行模式的基础，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维基础，中西方人权与文化权力的碎片

化才产生了差异。在第七章中，通过考察中国的宗教与医学对东方文化权力碎片化的实践模式进行了探讨。主要涉及的层面是神权运行过程中的东西方模式，中西医医学实践过程中人的在场与缺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东方的文化权力模式。第八章至第十章主要考察了美国的文化权力运行方式。其中，第八章从麦当劳与文化意义上的民主和麦当劳的“四化”原则两个问题入手，讨论了麦当劳的民主主义中文化权力的普遍化及其理论逻辑并对“麦当劳现象”进行了反思。第九章以身体文化理论为基础并以简·方达的健美操为案例阐明女性主义对男性主义和男性父权的反抗，并通过身体合法性反抗的文化表达使女性主义从被忽视群体逐渐成长为独立“她者”。第十章讨论了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民主性并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存在于美国的历史与传统之中；在实践中高等教育的规模、学制、管理与课程结构也充分体现了文化权力的民主性；在理念上，民主性一直是美国教育的最终目标。第十一章通过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计算机系统中的产品与工具的应用、互联网中的文化权力的表达的介绍，论述了信息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权力的碎片化过程，并认为信息时代环境下的电子产品和互联网应用不仅体现了文化权力表达和文化权力碎片化的全球性，同时也体现了后现代文化全球性，并最终体现某种世界文化的一个结合点。

在“结语”部分，作者对本书论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所得到的结论是：碎片化是文化权力的存在和另一种回归；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文化权力碎片化。这部分还对中美之间的文化权力碎片化进行了比较和展望，并认为后现代文化的共同经历可以促进东西方异质文化的理解、尊重、宽容与和解。

由于作者受水平所限，本书在成形过程中难免会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论证上，思维过程、逻辑结构，甚至是在基本概念上尚有许多欠缺；二是论述上，文字驾驭、言语方式和叙事风格多有欠妥之处。为此，我们恳请读者不吝赐教，以便未来订正。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后现代文化权力的碎片化	(1)
一、关于后现代文化	(1)
二、关于文化权力	(6)
三、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文化权力碎片	(10)
第二章 文化从形成到定义过程中的人文主义	(17)
一、简单回顾：文化的定义	(17)
二、从形成到定义：文化的再认识	(18)
三、从定义到功能：文化的解读	(24)
四、文化的大众性与碎片化	(28)
第三章 文化权力碎片化的经历——从神话时代到后现代文化时代	(30)
一、世界历史的分期与文化权力	(30)
二、神话与信仰时代：中西方文化权力从相似到分野	(31)
三、理性时代：文化权力的压抑与压制	(34)
四、后现代文化时代：文化权力夺取与回归	(38)
第四章 西方人文社会学科中的文化权力碎片化	(41)
一、文化研究中定义和概念的张力与权力转向	(41)

二、西方文化研究的三个逻辑	(44)
三、人文社会学科中的文化权力	(45)
第五章 语言学转向语境下的语言、文本与史学	(53)
一、语言中的文化权力及其碎片化	(53)
二、文本对文化权力的颠覆	(60)
三、语言学转向：历史学对结构主义权威的质疑与反抗	(66)
第六章 中国哲学中人文主义的路径与文化权力的碎片化	(73)
一、哲学理念中的民本与人本	(73)
二、集体主义意识中的文化权力模式	(76)
三、人权与文化权力的碎片化	(79)
第七章 东方文化权力碎片化模式：中国的宗教与医学	(82)
一、宗教：神权运行的东西方模式	(82)
二、医学：人的在场与缺场	(86)
三、讨论：东方的文化权力模式	(90)
第八章 美国的文化权力运行方式：麦当劳的民主主义	(93)
一、麦当劳与文化意义上的民主	(93)
二、麦当劳的“四化”原则	(95)
三、文化权力的普遍化及其理论逻辑	(103)
四、“麦当劳现象”反思	(107)
附录：各国麦当劳有关麦满分的食品清单	(112)
第九章 简·方达：从身体塑造到独立“她者”	(114)
一、关于身体的理论学说	(114)

二、身体的合法性：简·方达的自我控制	(119)
三、低调的反抗：简·方达的文化权力表达	(122)
四、从被忽视群体到独立“她者”	(124)
五、简·方达现象反思	(127)
 第十章 美国高等教育的民主性	
一、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与传统	(130)
二、规模、学制、管理与课程结构	(132)
三、民主性与教育的目标	(136)
 第十一章 信息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权力的碎片化	
一、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138)
二、计算机系统中的产品与工具	(141)
三、互联网中的文化权力的表达	(145)
 结 语	
一、碎片化是文化权力的存在和另一种回归	(151)
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文化权力碎片化	(152)
三、中美之间：文化权力碎片化的比较	(156)
 参考文献	
	(158)

第一章 后现代文化权力的碎片化

一、关于后现代文化

后现代文化从根本上受制于、对应于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①。关于后现代文化的定义，可以从科斯洛夫斯基的著作《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中得到启示：“后现代文化毋宁是这样一种社会的文化，它能够用人性的、符合人们意愿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同时又保持与往昔、传统的平衡。”^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社会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特征，主要是科技的作用凸显、商品生产与消费向日常生活领域渗透、消费功能与消费方式的变化以及文化日益商品化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都可以归结为文化问题^③，或者说是后现代化的文化问题。自那以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开始颠覆、渲染和浸透着西方学界，后现代主义的术语也渐渐地流行于学术刊物的字里行间，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氛围慢慢地形成气候，并成为一个“国际文化”的命题^④。然而，真正说起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要义，很少有人能够高瞻远瞩地提供一个清晰的概念。在国内学术界，概念上的茫然依旧，不过赵一凡先生在《西方文论讲稿》中的点拨给人心头一亮的感觉，我们从中得到的启发是：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形成首先要认识现代性，认识了现代性才能更好地理解后现代主义，当然反之

^① 赵一凡：《西方文论讲稿：从胡塞尔到德里达》，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②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著：《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毛怡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中文版前言。

^③ 陈治国：《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④ 赵一凡：《西方文论讲稿：从胡塞尔到德里达》，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亦然^①。

本书一点也不打算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理论分野过多地纠缠，也不试图就后现代的特征作特别的探讨，但是在繁芜杂乱的定义与概念之间理出一点思路，牵出一些头绪的必要性还是存在的。首先要把后现代主义理论与现代主义作一个粗线条式的区别性理解。在这一点上，Hal Foster 所做的解释似乎比较令人接受，也更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和气质。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定位是双重的，既有对现代主义进行解构和颠覆现状的企图，也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应和补充^②。其次，既然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是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么，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自然也就汲取和掺和了现代主义的一些文化元素。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可以被称为后现代文化与文化研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Grossberg 说，文化研究审视特定实践如何置于，以及它们的生产性如何决定于社会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现实体验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前的后现代研究与文化研究发生了交叉。这并不是要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一种政治和理论主张，而是要注意它对当代文化和历史生活性质的描述^③。可能是由于文化定义的复杂性，文化研究的对象也包罗万象，似乎无所不在，文化研究的范围包括：文化研究自身的历史、性别问题、民族性与民族认同问题、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问题、大众文化问题、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学科政治学、话语与文本性、重读历史、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④。正因为如此，Hassan 说，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难以定义的“飘忽不定的幽灵”“今天，我对它的了解，甚至比 30 年前我刚开始研究它的时候还要模糊，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变了，我变了，世界变了。”^⑤ 美国学者波林·玛丽·罗斯诺也说道：“后现代这个术语的运用是如此地广泛，以至于它似乎可以运用于任何事物，同时也无法运用于任何

① 参阅赵一凡《西方文论讲稿：从胡塞尔到德里达》，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16 页以及“后现代史话”部分。

② Hal Foster, “Introduction”, in Hal Foster, ed., *Postmodern Culture*, London: Pluto, 1985, p. xi – xii.

③ 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动》，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0 页。

④ L. Grossberg, etc., ed., *Cultural Studies*, Routledge, 1992, p. 18.

⑤ Ihab Habib Hassan, “From Postmodernism to Postmodernity: The Local/Global Context”,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Vol 25, Number 1, April 2001, p. 1 – 13.

事物。”^①

尽管如此，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仍然有目共睹，这方面国内学者总结了西方学人的观点后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从他们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区别性论述中，我们大概可以窥出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主张和特征：现代主义崇尚崇高的美学，而后现代主义与消费主义文化合拍，与通俗相结合^②，反（精英）文化及其走向通俗的（大众化或平民化）的价值立场^③；现代主义追求宏大叙事，而后现代主义则热衷稗史（les petits histories）；现代主义的本体论是确定的，致力于建设世界模型，而后现代主义则不确定，试图分解模型；现代主义的文本显示出结构的统一和意义的确定，具有一定的深度感，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则以颠覆和互文性为其特征，以拆除文本的深层结构为其目的；现代主义的阅读策略是视文本为一个封闭自足的客体，意义产生于作者与文本和文本与读者双重关系之中，而后现代主义则对作者全然不顾，代之以更注重读者对文本的阅读与接受过程，意义的产生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的构建，文本对读者开放^④，因此，语言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它在塑造我们关于世界、文学、文本和我们自身方面具有重要功能。……意义与其说是作者赋予的，不如说是读者和作者对话的产物^⑤。此外，后现代主义者主张表演性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performance）和活动经历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events）。他们以自己独创的手法来否定语言，否定形式，否定艺术，而反艺术的同时，这些手法本身也常常滋生出新的艺术种类，即，艺术取消自身，艺术反自身，艺术成为一种自我反射的游戏，艺术松散地、甚至任意地规定自身，艺术拒绝解释^⑥。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不同之处还在于：用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话来说就是“把现代主义逻辑推到

^① 波林·玛丽·罗斯诺著：《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② 王宁：《后现代主义：从北美走向世界》，载于陈晓明主编《后现代主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③ 陈晓明：《历史转型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载于陈晓明主编《后现代主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④ 王宁：《后现代主义：从北美走向世界》，载于陈晓明主编《后现代主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⑤ 黄剑波：《写文化之争——人类学中的后现代话语及研究转向》，载于《思想战线》2004年第4期。

^⑥ 王宁：《后现代主义：从北美走向世界》，载于陈晓明主编《后现代主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了极端”的产物^①；用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的话来说就是“后现代主义从现代主义那里继承了破碎的或分裂的自我，但却彻底抛弃了原有的批判眼光”^②。尽管有着诸多的比较，在西方后现代理念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定义，但是正如伊格尔顿等人所说的那样，后现代仍然可以从三个大的方面加以界说：（1）后现代是一个历史阶段，在西方文化的历史上，它相对于近代和现代。（2）后现代是一种美学风格，用这一概念可以去理解后现代历史阶段中的一种普遍的审美风格。（3）后现代是一种哲学思维，可以用这一概念去总结后现代历史阶段中各哲学流派的共同特征^③。后现代主义以对工业经济时代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价值体系与知识体系的全面解构为特征。在价值和知识领域，他们致力于消解同一性，向主体性、整体性、稳定性、决定性开战，而倾向多元性、不确定性、间断性、不稳定性、散漫性、模糊性；他们解构了现象与本质的区别、表层与深层的差异、真实性与非真实性的对立、异化与非异化的分歧、所指与能指的界限。

利奥塔尔说，后现代知识“能够使我们形形色色的事物获取更细致的感知能力，获致更坚忍的承受力宽容异质标准。后现代知识的法则，不是专家式的一致性；而是属于创造者的悖谬推理或矛盾论”。

这些区别性特征的描述不仅使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主张有了一些了解，从中也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是建立在对现代主义不满和批判的基础之上。从上述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对现代主义的不满主要体现在对现代主义的专制上：不满美学的独裁式地自认为崇高而对大众通俗文化加以鄙视；反对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的话语霸权而忽视“稗史”的历史价值；在文本问题上，抵制作者的权威解释而提升作为大众的读者的判断；反对结构主义的中心地位，通过解构达到非中心化的目的；行为上通过大众的参与达到实现民主的目标。在整个现代社会到处充斥文化权力的结构中，人的精神自由已经不复存在，每个人必须按照文化权力网络控制的程序分配的话语选择自己的生活。现代文明的发展造成的不仅是技术理性对于人的压迫和强制，还在于人们已经自然地适应了文化权力所分配的话语资源，并在各自区隔的网络中为

① 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 页。

② 特里·伊格尔顿：《资本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载朱立元、李钧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33 页。

③ 张法：《中国人民大学美学教研室之“从比较美学看后现代以来的文艺理论”阶段成果》。

了争取被束缚而展开竞争和斗争^①。总之，后现代主义反对的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声音、一个中心、一个权威所形成的一个结构，而所推行的是多元化的广阔包容、多中心主义的普遍存在、去权威化的大众参与。在解构观看来，中心主义确实曾经在维护秩序方面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中心只是一种结构功能，因此它也随时间不断被新的力量替换而形成万物的生生灭灭以及多元、开放、无限的宇宙^②。

后现代的社会主要是由那么几种社会构成的：后工业社会、消费者社会、新闻媒体社会、电器社会^③等。这几种“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后工业社会、消费者社会以及电器社会表明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新阶段，或者说是工业化时代的终结。在现代社会里，机器化不仅给人们的物质生活提供了更为有效的保障，而且也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了空虚的伤害。一方面，消费者社会预示着对宗教等权威崇拜的普遍停止，人们的生活中心由心灵转移到了物质上面来。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物质的普遍和过分的崇拜，也导致了心灵的空虚，因此后现代主义者所批判的当然也包括工业化社会和消费社会的这种拜物倾向。如果后现代主义者所追求的是解构现代主义，反叛现实的话^④，那么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肯定是对上述社会的种种现象持批判态度。新闻媒体社会则是另外一回事。它所体现的是作者权威受到置疑，而读者的解释权和独立判断受到尊重的倾向。正因为如此，电视常常被看作是后现代文化的精粹^⑤；也正因为如此，利奥塔说，每一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成为艺术家^⑥。

正如对后现代主义在定义上的复杂性一样，对文化的理解也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学术界没有一个完全的共识，文化学家们既不能在微观上相互同意彼此的观点，也无法在宏观方面妥协地取得一致，但是，后现代主义却对文化

^① 左春和：《文化的权力与同一》，载“文化发展论坛”，2012年12月18日。

^② 郑敏：《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 ix。

^③ 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④ Hal Foster, “Introduction”, in Hal Foster, ed., *Postmodern Culture*, London: Pluto, 1985, pp. xi – xii.

^⑤ Jim Collins, *Postmodernism and Television in Channel of Discourse, Reassembled*, edited by Robert C. Allen, London: Routledge, 1992.

^⑥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79.